

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

汪子嵩

当前正在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肃清林彪和“四人帮”的流毒，冲破他们设置的禁区，解放思想，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就解决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所以，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可是，林彪和“四人帮”却公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最根本的原理，从根本上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林彪把理论夸大到可以决定一切创造一切的位置；张春桥公然说：“思想上的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的”，他提出“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和“实践——认识——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根本对立。这种对立，就是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对立，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论的根本对立。

我们有些同志在口头上也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根本道理，但是一接触到具体问题，他们就忘记了，甚至出来反对这个原理。这次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有的同志就是这样的。他们强调马列主义一提出来就是真理，以此否认实践的检

验。他们说：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那么，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党提出的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如此，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他们由此推论说：因为你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出来的时候不是真理，这就是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所以，他们的结论是：说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象这样提出问题，恰恰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那种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难道说：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就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提出来的时候不是真理吗？如果这样理解，本身就是形而上学，不懂得认识论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如果断章取义地从这整句话中抓住“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就自以为

可以振振有词地大讲特讲“提出来的时候”就是真理，毋需经过实践的检验，这是搞片言只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提出来的时候是真理。但它们为什么能够是真理？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天才，从他们脑子里想出来的就是百分之百的绝对真理吗？当然不是。那样提出问题的同志似乎忘记了毛泽东同志为此曾专门写了一篇很重要的哲学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同志说的是“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专门加了“科学地”这个副词，就是说这些学说提出来的时候，就是从实践中来，已经实践检验的，所以是科学的真理。列宁关于一国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所以是真理，是列宁根据大量实际材料，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情况，认识了从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客观规律，而后才得出来的科学结论。我们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当然也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总结了我国二十多年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特别是在批判林彪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所以得到人们的热烈拥护，愿意为贯彻执行这条路线而奋斗。怎么能把这些理论的提出和它们经过实践的检验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呢？

只有那些由所谓的天才人物头脑里想出来的、自命是百分之百的真理，才是不可信的，我们必然要怀疑它。恩格斯早就说过，只有实践才是对于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怎么我们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而犯了“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的弥天大罪了呢？这些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常识抛到那里去了？

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真理，还要不要再经实践的检验？这也是有些同志提出来的问题。有的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真理，那么，它为什么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

这种认为已经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真理，便毋需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的看法，是只看到真理的绝对性，忘记了真理的相对性，属于机械唯物论的认识论。机械唯物论的认识论是反映论，但是他们把反映看得和镜子反映客观事物一样。客观事物是怎么样的，镜子里反映出来的形象也就是怎么样的，因此，人们认识客观事物，一下子就可以得到绝对的真理。这种认识论是形而上学的，不懂得辩证法。因为任何客观事物本身都不是那么简单，而是无限复杂的，它们又是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的，人的认识能力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我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必须是一个过程，从现象的认识深入到其本质的认识，从不完全的认识到比较完全的认识。尽管是已经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它也具有相对性，随着客观过程不断向前推移，它还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才能得到比较更完全的认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必须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反复的过程。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出：实践标准既是这样的“不确定”，又是这样的确定；它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专门讲了一节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开始就指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然后具体阐述了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怎样经过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实践，才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同志说，他讲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

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教导非常重要，可以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一些，打破林彪和“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他们动不动讲什么“绝对真理”，仿佛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群众只能无条件地背诵这些真理，照他们所说的去做，那里还需要再经实践的检验呢？

实践证明，要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很不容易的。二十八年来，我们有不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付出了不少代价，但是直到现在，恐怕还只能说是认识得很不够，远远没有进入自由王国。我们已经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是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它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务，应该这样做。但究竟怎么样才能真正做到多快好省呢？我们认识得还很不夠。过去干了许多事，有些是符合多快好省的，还有许多事情，原来主观上是想多快好省，实践结果却是少慢差费。所以今天我们还必须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研究怎么样才能真正做到多快好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讨论了，订出具体的方针政策，还要再拿到实践中去，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又来总结经验，加以修改补充。只有经过这样反复的实践检验，才能比较正确地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要是以为我们已经提出了十一大路线，它已经是真理了，就万事大吉，不需要再经实践的检验，不必再调查研究解决许多具体问题，那是必然要失败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路线也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条基本路线当然很重要，如果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就必然要走向修正主义。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阶级矛盾？在不同时期这些矛盾又是如何具体表现的？等等，还有许多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和论述中，为我们指出了许多重要的原理和原则。但这些原理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我们决不能说是已经弄清楚了。甚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例如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影响，到现在我们的认识并不是一致的。有些同志还认为搞按劳分配，农村有自留地、集市贸易，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甚至有人认为劳动人民收入稍为增加一些，生活提高一些，也是“资本主义”；认为知识多一点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在他们看来，好象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富一些就是“资本主义”，只有永远一穷二白才是社会主义。这些问题都是被林彪和“四人帮”搞糊涂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修正主义去批，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去批，颠倒敌我关系，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路线篡改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对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只有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从实际出发，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才能逐步认识和掌握它们。林彪和“四人帮”采取的是相反的认识路线，他们根本无视客观规律的存在，把主观能动性夸大到极端，宣扬主观唯心论。本来，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同时又承认精神的反作用，承认主观能动性。在我们中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里，要进行革命，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辩证唯物论所讲的主观能动性，首先指的是革命的实践活动。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和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运用这些规律，促进事物的转化，推动革命向前发展。所以，在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之间，客观规律是第一性的。客观事物的发展规

律，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反而是决定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林彪和“四人帮”却宣扬理论至上、精神决定一切、上层建筑决定论。在他们看来，客观规律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可以由理论、由他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任意塑造和修改的。他们不正是根据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捏造了不少“规律”吗？什么“民主派必然变为走资派”、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等。

他们所讲的理论，既不是来源于实践，又毋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反而是高于实践、决定实践的。这种高于、先于实践经验的理论，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这种理论，从它开始提出的时候起，就是绝对的真理，是永恒的，没有发展的过程。这样的理论是从那里来的？只能是在天才人物的头脑里面固有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愚氓，对于这种天才理论只能顶礼膜拜，不理解也要执行。所以，唯心论的先验论总是和天才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二

前一段时间，有些同志分析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世界观，发表了一些好文章。大家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认为林彪、“四人帮”搞的是主观唯心论、形而上学，采用的是实用主义的手法。但是，究竟林彪、“四人帮”的世界观的核心是什么？看法还没有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是唯心论的经验论。象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批判的马赫主义一样，林彪、“四人帮”也认为他们的感觉经验就是一切，什么都从他们的“自我”出发，所以，他们的哲学也是唯我论。有的同志却比较强调林彪、“四人帮”的世界观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本来，林彪、“四人帮”是实用主义者，对他们有用的就是真理，所以，他们可以今天这样讲，明天又那么说。在他们那套反革命谬论中，可以说是唯心论的经验论的实例确实也不少。但是，特别通过这一次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我越来越感觉到，林彪、“四人帮”的世界观中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他们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最深，今天比较难于肃清的问题，还是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七〇年就已经指出的，是他们搞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天才论。

毛泽东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明确指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正是要批判林彪、陈伯达宣扬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天才论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批判在当时并没有发动起来，因为陈伯达和林彪虽然先后垮台了，而“四人帮”依旧窃取舆论宣传大权，他们自己就是和林彪、陈伯达一起搞先验论和天才论的。他们只在报刊上发表极少数几篇文章，敷衍了事，草草走了过场。先验论和天才论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反而被“四人帮”乔妆打扮，变本加厉地搞起来了。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要在理论上肃清他们的流毒，必须正本清源，这就必须批判他们的世界观的核心——先验论和天才论。现在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正是捅到了林彪、“四人帮”理论的这个核心和要害上。所以，讨论这个问题竟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原因就在这里。

为了认识这个问题，可以简略回顾一下历史。

早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就打着“高举”的旗号出来表演了。他把“高举”

喊得那么响，是为了打击其他领导同志，说别人不高举。在批林批孔时抛出林彪的材料中，曾经揭发林彪为准备那次报告，怎样弄虚作假，揣摩听话人的心理，搞两面派手法。但在那时候，“四人帮”当然不会把他的这套手法和他讲话的内容结合起来批的。林彪看到他在那一次讲话中得到了好处，以后，“高举”的调子就越唱越高。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大肆宣扬什么“最高最活”、四个“伟大”、三个副词，什么三“忠于”、四“无限”，什么“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顶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全世界五百年、中国几千年才有一个”，等等。谁要是对他的说法有点不同意，立刻会被打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反分子”。他还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什么“万寿无疆”，实际上是要祝他自己“永远健康”。这哪里是在搞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在搞宗教迷信！这难道不是把革命导师加以神化了吗？！

“四人帮”搞的一套是林彪的继续和发展。因为林彪挨了批，所以他们干得巧妙一些。在口头上，“天才”这样的字眼不再用了，但在实际上，他们主要是搞语录。他们把革命导师的一些话，上下文都砍掉，人们根本不知道是在什么场合下，针对什么问题讲的。只要对他们有用，他们就把这片言只语抽出来，当作绝对真理。还只能由他们来解释，他们要用来攻击谁，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作解释。“四人帮”既然控制了全部舆论工具，就可以肆意歪曲、篡改，甚至伪造。这样，实际上是利用了革命导师的某些个别语句，“四人帮”制造出许多反革命的谬论，什么“党内有个资产阶级”，什么“民主派到走资派”，什么“全面专政”，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是走资派的命根子”，什么“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等等。这些谬论，和实际情况是不符合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相违背的。但是你不能反对，因为他们是以某一条语录为根据的，所以是绝对真理，任何人不许违背，连怀疑也不许。谁要是有点怀疑或反对，那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要“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就是这样，“四人帮”把林彪讲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付诸实践了。当然，对他们不利的话，即使毛泽东同志讲过许多次的，例如要批判天才论和先验论，他们是从来不讲。只是那些对他们有用的话，被他们歪曲篡改过的片言只语，才被奉为绝对神圣的东西。这样，“四人帮”在思想上理论上就设置了许多禁区。尽管许多同志心里已经认识到这些所谓“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相违背的，还只能照他们那么讲。本来，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实事求是，说老实话，照科学的态度办事。林彪和“四人帮”却把科学变成了迷信，要人们昧着良心说话。

在那时候，和林彪、“四人帮”这种假马克思主义骗子作坚决斗争的，正是毛泽东同志自己。

早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专门讲的是民主集中制，强调要让群众讲话，真正发挥群众的作用。毛泽东同志特别讲到：“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一年多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开始就提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都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中又专门讲到，“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要我们学习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这是很清楚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泽东同志对于林彪提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等口号非常反感，几次进行过批评，指出：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

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着“天才”问题爆发了一场大斗争。毛泽东同志的《我的一点意见》明确地批判了林彪和陈伯达宣扬的天才论和先验论。毛泽东同志特别提出警告：“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因为那次会议上有不少人跟着起哄，上当受骗。他们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因为林彪和陈伯达要宣传“天才”，反对圈掉“天才地”等三个副词。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分不清真假马克思主义，跟着林彪、陈伯达这类政治骗子起哄，闹了一场大笑话。

一年以后，林彪自我爆炸前夕，毛泽东同志又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这才是关于党、领袖和群众关系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林彪一伙这样强调“天才”，为的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早已揭穿了：“明日树我，实则树己”。林彪吹嘘自己是“三大助手”中“最伟大的助手”，比恩格斯、斯大林更“伟大”，说他的儿子是“第四个里程碑”；后来张春桥又把他的“春桥思想”吹嘘为“第四个里程碑”。这就是他们宣扬天才论的真正目的。

就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同志还批判了四个“伟大”，说它们讨嫌；批判过所谓“全世界五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批判过“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谬论。

最后还有一次，那就是在一九七五年“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他们所作的那段批判，也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违背这条根本原理的，所以都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四人帮”当然和一般的教条主义者不同，但是他们搞片言只语，把它们绝对化，这也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不要只提经验主义，放过了教条主义，就是要批判“四人帮”的这种搞法。特别是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再一次提出警告：“我党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得，其实不太懂。自以为是，动不动训人，这是不懂得马列主义的一种表现”。这些话是针对“四人帮”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而讲的。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揭穿了“四人帮”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还一再提出三要三不要的问题，对全党发出了警告。

我们简略地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这是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对立。

林彪和“四人帮”搞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天才论，根本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利用经过他们歪曲篡改的片言只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谬论。他们把这种所谓理论说成是绝对真理，规律可以由它们任意制造，实践必须服从这种理论的安排。他们手上只有谬论，没有真理，只能以势压人。谁要是对他们有点不同意见，他们就抛出大帽子来整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搞成宗教，把科学搞成迷信，在思想上理论上设置了层层禁区，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只能跟着他们，帮云亦云，根本破坏了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起来的我党的优良的学风、党风和文风。粉碎“四人帮”虽然已经将近两年了，但是许多同志至今还心有余悸，还要左顾右盼，不敢说话。有些同志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不能自拔，还要把他们的谬论当作真理，谁要是坚持正确的认识路线，就被认为是犯了弥天大罪。华主席再三指出：

对于“四人帮”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的影响和流毒，我们万万不能低估，必须坚决肃清它。

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论，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必须和实践相结合，坚持要发挥党和群众的集体智慧，让群众敢想、敢说、敢干。所以，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系列的教导，我们就能够识破林彪和“四人帮”的要害，批判他们的天才论和先验论，打破他们设置的重重禁区，从他们的思想束缚下面解放出来，来一个思想的大解放。

我们要解放思想，就是要从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我们要打破禁区，就是要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可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却污蔑我们，说我们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的禁区”。这就奇怪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是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思想怎么会成为禁区呢？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想用毛泽东思想的名义，设置禁区。这种禁区，我们必须大胆地将它打破。

这种禁区一定要打破，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一定要深入进行下去。毛泽东同志在二十年前就提出来要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要造成这样一个局面，就必须解放思想。谁也不敢讲话，不敢实事求是地讲心里话，动不动就怕人家打棍子、扣帽子，还能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吗？现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种种措施，就是要让群众讲话，造成真正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造成这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很重要。现在要贯彻十一大的政治路线，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全国人民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要赶快使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兴旺发达起来。我们具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发展得很快，怎么反而落后了呢？现在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建国二十八年来，不管是前面的十七年，还是后面的十一年，都是既有正面的经验，又有反面的教训。怎样区别正确和错误？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广大人民群众是心里有数的。我们要前进，必然要遇到许多新问题，究竟是让群众解放思想，把心里想的话讲出来，讲真话呢，还是动不动就扣帽子，不让群众讲话？最近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要贯彻民主集中制，让人民群众讲话的；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要大家解放思想，心情舒畅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群众也是这样希望的。但总有那么一种思潮要出来阻挡这个历史潮流的前进。他们把自己说成是“高举”的，说别人是“砍旗子”的。

毛泽东同志在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时，多次教导我们要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防止上当受骗。如果从口头上看，林彪、“四人帮”是把“高举”喊得最响的。所以，究竟怎么是真高举，怎么是假高举？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从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才能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当前这场关于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解放思想的斗争。只有真正贯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和作风，才能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才能解放思想，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解决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光辉榜样。违背了这个方针和作风，必然使广大群众心有余悸，不能解放思想，不敢放手大干。我们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当前最大的思想阻力就在这里。所以，当前这场争论，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争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

——批判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篡改和歪曲

谢 征

毛主席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郑重的、科学的态度。我们要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这完全是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反复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和这种郑重的科学的态度相反，林彪、“四人帮”为了篡改毛泽东思想，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在“高举”问题上大作反革命的文章。他们把毛主席说成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伟大的天才”，宣扬什么“顶峰”、“绝对权威”、“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大搞那套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三忠于”“四无限”、“忠字舞”、“语录牌”、“早请示、晚汇报”活动，这是对伟大导师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最大的亵渎和歪曲。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并没有彻底肃清，至今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上散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高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它不是凭空出现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毛主席多次讲过，中国共产党人是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的。毛主席说过：“如果有人，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又说：“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了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

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主席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次重大斗争的经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总结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斗争的经验，总结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总结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才提出来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没有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没有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总结的毛泽东思想。

这里所说的实践，显然是千百万人的革命实践，是阶级的实践，全党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阶级的代表，是群众的一员，他们同群众一道进行革命斗争，共同总结经验教训，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是阶级的、群众的智慧和意志的集中体现。他们的思想和理论为群众所掌握，同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就成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毛主席是从中国人民中间生长出来的领袖，与人民群众血肉相关。毛主席历来反对英雄创造历史的天才史观。他指出，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主席在揭露林彪的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阴谋时说过，缔造军队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在井冈山时期，他把“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称之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路线，把这一重大的理论贡献视为集体的创造。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亲自总结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的具体经验，肯定了五亿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提出了农业合作化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而推动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迅速到来。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时候讲过，谢谢几亿农民坚决抵制“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推动自己想问题。毛主席是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总之，毛泽东思想是来源于群众的革命实践、集中群众智慧的科学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和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富有生命力的表现。毛泽东思想来源于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也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引革命走向胜利的革命科学。正是从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出发，我们说，凡是违背客观实际，违背广大人民利益，为人民所反对的理论，决不是真理、决不会符合毛泽东思想。林彪、“四人帮”宣扬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大搞“三忠于”“四无限”之类封建迷信的活动，严重破坏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败坏了学风，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泛滥成灾。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理论和实践、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样也就失去了鉴别真理的客观标准，使他们炮制的种种同毛泽东思想“对着干”的反革命理论，得以冒充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而欺世盗名，祸国殃民。林彪的“革过去革过命的命”的反革命口号，“四人帮”的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理论，以及他们那不顾客观实际，不顾人民死活的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反动思潮，不都是打着对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最新发展”的旗号而风行一时，造成了乱党乱国的恶劣后果吗？我们应当认真吸取这个教训，恢复革命理论的本来面目，提倡以郑重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这样才是真正捍卫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战斗，胜利前进。

二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决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林彪明目张胆地宣布《资本论》没有用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过时了，蛊惑人心地提出，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只用百分之一的时间学习马列就行了。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完全一致的。看不到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也就无从了解毛主席是在哪些方面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毛主席历来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我们党的党章一再申明，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勾掉林彪在毛泽东思想前边加的三个副词，这决不是象林彪一伙所解释的那样，是出于“伟大的谦虚”，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尊重科学。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林彪、“四人帮”多年来不宣传马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于林彪、“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们必须引起应有的重视。比如，在资产阶级权利问题上，毛主席的论述本来同马克思、列宁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可是，“四人帮”却把它们对立起来，片面地在“限制”两个字上大作文章，这就篡改和歪曲了毛泽东思想，造成了思想、理论和经济政策上的混乱。可见，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同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学习和领会，这是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思想是由普遍原理和个别结论构成的。这些普遍原理是任何时候也不能违背的；而个别原理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来分析、解决革命实践中具体的实际问题的，虽然它也反映了普遍原理，却不能与普遍原理同等看待，有些则是针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个别事物讲的，所以不能离开时间、地点、条件到处去套用。另外，毛泽东思想对于某一个问题的论述，往往是针对各种不同情况，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而作的，只有把它们综合起来，全面理解，才能抓住它的精神实质。因此，林彪、“四人帮”鼓吹“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用“老三篇”、“老五篇”代替毛泽东思想，这决不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捷径”，而是肢解毛泽东思想，歪曲毛泽东思想，为实用主义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个别字句开了方便之门。前几年发生的打“语录仗”的情形，就是这种“走捷径”的恶果。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来把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反对把它们当作宗教教条。斯大林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毛主席在他的革命实践中，同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个别字句的教条主义者作过长期的斗争。著名的延安整风，就把整顿这种主观主义的学风作为中心任务。毛主席指出，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这个启蒙，就是要他们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最重要的道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吃这种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个别字句的亏还少吗？那些照“本本”指导革命的人，不是把红区搞掉百分之九十，使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吗？所以毛主席说“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

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林彪、“四人帮”在对待革命理论的态度上与教条主义者有某种

相似之处，但是实际上并不相同。教条主义者迷信本本，是因为相信本本；而林彪、“四人帮”宣扬对革命理论的迷信，却是为了愚弄群众，用实用主义的手法摘引片言只语进行歪曲，以行其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恶阴谋。他们“过头话”讲了无数，不过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无限忠”的样子，把“高举”这杆旗子抢到手，谁反对他们讲的“过头话”，就打倒谁，谁真正拥护毛泽东思想，他们就打倒谁。这正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假左真右的特点。实际上，他们哪个时候相信过“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呢？毛主席在批判林彪的时候就指出，关于不设国家主席，讲了六次，一句顶一万句，就是六万句，可林彪就是不听。毛主席也尖锐地批评“四人帮”“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可是他们照样搞。

今天，林彪、“四人帮”所谓“高举”、“紧跟”的假象，摘引片言只语的骗术早已被彻底揭穿，但是他们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并未根除，拘守个别字句而不能领会毛泽东思想精神实质的情形仍然存在，搞本本主义、照抄照转的错误倾向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必须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作启蒙运动”，大力宣传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

三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它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一方面，客观世界是处于不停顿的运动之中，人的认识必须随着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而变化；另一方面，人的认识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符合实际，往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的往复循环，才能取得比较符合实际的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总是不回避实际生活和革命斗争提出的新问题，而是从实际出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分析解决这些问题，它总是不固守经过实践检验已经过时的旧的个别原理和结论，而是用新的原理和结论去代替它们。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思想才永远保持它锐利的革命锋芒，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林彪、“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顶峰”、“绝对权威”、“最高最活”。既然是“顶峰”“绝对权威”那就不能发展了，这也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了僵死的教条。毛主席在批驳林彪、“四人帮”所谓“顶峰”、“绝对权威”的谬论时，就针锋相对地指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凡是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在这里，毛主席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批驳了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说明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由于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是具有相对的真理性的。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使人们逐渐地接近于绝对真理。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的接近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又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人类认识客观真理的道路，却没有结束真理的发展。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

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在继续向前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将随之而发展。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认识真理的道路去探索和研究。毛主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制订的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方针、政

策，今后我们还要坚决执行。但是，毛主席制订的理论、方针、政策还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去检验和证明，靠我们的实践去充实和完备。我们决不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条文上。斯大林在批判机会主义时指出，他们“企图拘守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个别原理，把它们变成教条，这样来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因而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林彪、“四人帮”就是斯大林说的这种机会主义者。他们说什么，“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照办就行了。”他们把人们从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活动看成只靠小说家笔下的“锦囊妙计”就可以奏效，纯属无稽之谈。

当前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些是毛主席已经解决了的；有些是毛主席预料到了但未来得及解决的。例如关于如何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毛主席制定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两条腿走路”、几个同时并举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但是，由于受到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加上我们在认识上的摇摆，所以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好。一些经济部门出现了徘徊和停滞的局面。关于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问题，毛主席指出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可是多年来，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他们以自力更生为名，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以致造成在六十年代初我们与外国已经缩短了差距后来又拉大了。在当前的形势下，为了尽快把我国国民经济搞上去，不但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还要引进外资，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关于按劳分配原则，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提出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但是我们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问题上常常摇摆，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背离了这一原则，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毛主席一贯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探索，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情况相结合方面都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成功经验。多年来，我们闭目塞听，对世界上许多事情并不了解，现在我们同外界的交往增多了，进一步研究人家的经验，取长补短，探索出适应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是非常必要的。总之，关于新时期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不能设想在毛主席著作中都有现成的答案。不能认为毛主席著作里没有的，毛主席没有说过的就不办。也不能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一律照搬无误，把自己变成一部留声机或传声筒，放弃了认识和探索新鲜事物的责任和义务。那是毛主席历来所反对的作法。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华主席、党中央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采取了一系列英明决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与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解决当前国内外的实际问题，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捍卫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我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口号正在变成现实。我们完全有信心，不用二十三年的时间就会实现四个现代化。华主席、党中央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光辉典范。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紧跟华主席胜利前进！

回忆跟随朱总司令的日子

陈友群

敬爱的朱德委员长离开我们一年了。你是红司令；是人民的光荣。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朱委员长的崇高赞誉，是全国全世界人民心中永存的丰碑。林彪、“四人帮”颠倒黑白，篡改历史，千方百计诬陷他，迫害他，可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热爱他，崇敬他，始终把他看作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八亿人民已亲手把毛主席的英名，把敬爱的周总理和敬爱的朱总司令的英名，一起绣在光芒万丈的革命历史的金匾上，永不磨灭。

“总司令”，这是多少年来同志们对朱委员长的尊敬而亲切的称呼。总司令革命一生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我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期间受到的教诲和熏陶，真是笔墨难尽，终生难忘。

忠于党 忠于毛主席

朱总司令毕生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无论是指挥作战、处理工作或出外视察，不管多么繁忙，他总是挤出时间认真阅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记得一九五三年秋，总司令对我说：主席批评一些同志“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言不及义，就缺乏共同语言了，你们要很好注意这个问题，只有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才能有共同语言，才能搞好社会主义。早在毛主席党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等三十本原著的决定以前，总司令就经常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于毛主席著作，他更是逐段逐句地圈点研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前夕，当他收到一些文章的清样时，他就认真阅读，特别是对《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经典著作，他读得非常仔细，逐句用毛笔圈点。他对我们说：主席的文章深入浅出，深刻生动，讲的事实、道理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容易体会，读起来特别亲切，你们要好好学习。讲完，还把他读过的清样给我们学习。我把总司令仔细阅读、圈点过的《矛盾论》清样珍藏了十几年。

总司令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崇敬和热爱，每每洋溢于他的雄伟诗篇之中。在《辛亥革命杂咏》（之七）里，总司令写道：

列宁评论大文章，指出中国革命方。

先进亚洲从此始，发扬真理更辉煌。

“发扬真理更辉煌”，这是他热情地歌颂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践紧密结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遵义会议》一诗中，总司令满怀革命激情，生动地记录了我党经过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树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之后那种群龙得首、反败为胜的新局面：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在《喜读主席词二首》中：

.....

无产者必胜，领袖砥柱坚。

几度危难急，赖以转为安。

总司令以高亢而纯朴的诗句，总结了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切身经验，即无产阶级的每一个胜利，革命征途上的每一次转危为安的转折，都有赖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朱总司令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这种坚强的党性，表现在他始终坚持搞马克思主义，维护党的团结，顾全大局，光明正大，从来不搞阴谋；对于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等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他一直是坚决抵制、坚决斗争的。这种坚强的党性，还表现在任何情况下，他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和自己率领的军队置于党中央、毛主席的绝对领导之下。他坚决反对张国焘、林彪、“四人帮”等资产阶级野心家搞分裂主义、妄图把军队变成个人独立王国的罪行。总司令常说：手中有兵权，要谨慎又谨慎，要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绝不可做违反党和人民利益的事，绝不可离开“党指挥枪”的原则。在《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五周年》一诗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写道：

建军总原则，党的领导尊。

非军指挥党，唯党指挥军。

从中国工农红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当了几十年的总司令，誉满全国全世界，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不但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而且常常以此教育部下，为全党、全军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坚持真理 刚毅不拔

朱总司令坚持真理，刚毅不拔的精神，对我的教育特别深。真理一经认识，总司令总是坚持到底，从不半途而废。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总司令认清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就到处寻找党的组织。一九二二年，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他和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一起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的第一枪。在起义队伍于广东被打散、反革命猖狂进攻的危急关头，总司令坚定不移地高举革命旗帜，率领部队在闽粤赣边区打游击，发动了湘南起义，并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师。长征途中，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分别率领右路军和左路军北上抗日。总司令在左路军中坚持毛主席党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线，同坚持右倾逃跑的张国焘展开坚决的斗争。张国焘以枪炮相威胁，总司令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终于粉碎了张国焘的逃跑分裂的阴谋，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在各路红军会师陕北后，总司令对张国焘斗争的胜利得到了

毛主席的高度评价。毛主席说：“你斗得有理，有节，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

解放后，为了把我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司令也是用这种刚毅不拔的精神来领导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为了促进石油工业的发展，总司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就找地质部门负责同志了解石油地质勘查情况。他坚决反对所谓我国是“贫油国”的谬论。他指着地图对我们说，既然西伯利亚一带有相当的石油蕴藏，为什么到了我们东北就没有石油了呢？不能相信苏联专家那一套。总司令亲自到石油工业部同余秋里同志和计划司的同志一起研究发展石油工业问题。总司令很关心林业的发展，派我们下去作调查研究，他去东北视察时深入林区，把有关负责同志找到火车上谈话。在深入研究之后，向毛主席党中央写出建议，毛主席党中央接受总司令的建议，增加了对林业的投资。

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为了篡党夺权，大搞“清君侧”，肆意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同志。他们以“战备动员”为借口，把八十三岁高龄的总司令“下放”到远离首都的农村。在抵达指定地点前的很长的一段路程上，汽车也不给一部。总司令泰然自若，迈开双腿往前走，不减当年长征时的老英雄本色。走得实在累了，就在路边的树墩上坐一会，再继续前进。总司令他老人家乐观豁达，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坚信不移。面对林彪一伙的种种迫害，他依然是刚毅不拔，昂首前进，把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踩在脚下。

不但在革命斗争中如此，就是在生活上，也处处可以看到总司令这种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刚毅不拔的精神。一九五一年春，总司令患病初愈，中央决定他到杭州疗养。在杭州，他除了看书学习、关心地方工作以外，他每天坚持锻炼，健康恢复得很快。他要爬山，医生劝阻。他说不要紧，慢慢地爬。经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南、北高峰，玉皇顶，他都先后爬上去了。第一次爬山时，他匀步往上走，决心走到山顶，走了大半路程，身边的同志怕他太累，劝他不要再爬了。他仍说不要紧，果然走到了山顶。他幽默地说：“我看你上得了上不了，终于把你踩在脚下了”。大家都为他老人家的这种刚毅精神所感动，都高兴地笑了。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日，正当“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疯狂破坏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总司令为他的夫人和战友康克清同志题写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革命到底”，这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是他毕生的豪情壮志和伟大实践的光辉记录，也是他老人家留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谆谆遗嘱。

关心群众 爱护干部

一九五六年六月，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中，朱总司令深入农村，视察呼和浩特市郊的红星蔬菜合作社，同干部群众谈话。这个社在三年多时间里由七户贫雇农发展到拥有三百二十户、一千三百多社员的大社，生产发展很快，社员收入逐年增加，公积金不断扩大，男女社员意气风发，田间蔬菜整齐茂密。总司令看了非常高兴，勉励干部社员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把合作社办得更好。第二天，总司令又到桃花板视察了一个中等社和一个三类社，同支部书记、社长、会计、社员分别谈了两个多小时，鼓励他们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进经营管理，向先进社看齐，打个翻身仗。在前往内蒙视察的途中，车过集宁，抵达卓资车站时，总司令利用停车时间，访问了车站附近的几户居民。每到一家，总是仔细察看室内的陈设，询问有几个人参加工作，收入多少，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当听到大家说生活比过去好得多了，没有什么困难时，总司令表示满意。他勉励大家说：还要不断发展生产，才能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国家的事要大家努力来办，才能办好。总司令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家探亲

时，他总是嘱咐大家了解当地的工作和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总司令对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是多么关心啊！

一九三九年总司令在太行山指挥抗日战争时写下的《寄语蜀中父老》一诗，深刻地记述了他关心群众、热爱战士的深挚感情：

佇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

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总司令非常注意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一九五三年，他在党的第二次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作的《过渡时期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报告中，号召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随时了解、检查和纠正党员干部侵犯群众利益的思想 and 行为，并认真处理党员、干部的检举、控告、申诉案件，切实做好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以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

总司令对干部对下级信任，宽厚，平等待人。一九四九年冬，组织上决定我到总司令身边工作时，我心情有点紧张，感到自己水平低，缺乏经验，怕完不成任务。我到职第一天，正好参加总司令召开的一个小型会议。会上，我看到总司令是那样慈祥和蔼，平易近人，没有半点“大首长”的架子，我的紧张情绪开始缓解了。会后，总司令同我谈话，总司令说：最近工作多些，叫你来当秘书，帮助做点工作，事情要大家来做，我们应当把事情做好，相信也是能够做好的。这番亲切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总司令平时分配我们工作任务时，简明扼要地把目的要求讲清楚，尽量发挥大家的主动性积极性，使大家自觉地完成工作。他耐心听取汇报，当听到不正确或不妥当的意见，就及时指出，讲清道理。我在他身边工作八年，从没有见过他发脾气，连一句粗声责备的话也没有听到过，不管是对谁。总司令这种真正平等待人的态度，使我们对他老人家更加尊重和敬爱。

总司令从政治、思想、生活各方面关心、爱护干部。总司令经常勉励我们努力学习，不要虚度年华，要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做好党和人民托咐的工作，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的原则，不要沾染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一九五〇年五月，总司令在一次党的干部会议上严肃批评了某些党员干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人物，……胸襟要广阔，气量要宏大，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把精力集中在革命事业上，不要为个人地位待遇问题去苦恼，不然党和人民就会丢弃你们。”总司令很注意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一次，一个干部受到批评，思想不通，流露委屈情绪，总司令教育他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正确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说：好人说不坏，坏人说不好，你自己对革命应有信心。总司令亲自调解一个身边工作人员的家庭纠纷，找他们两口子谈话，教育他俩搞好革命团结。一九五一年总司令到杭州养病，临行时把一个刚刚出院、医嘱需作短期疗养的身边工作人员带去，让他跟自己一起疗养，使这个同志很快恢复了健康。

总司令在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期间，除了从纪律检查工作方面积极保证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外，对于党员干部违犯党纪问题的处理，始终坚持严肃慎重、分清是非轻重的原则，坚持以党内教育为主、以执行纪律为辅的方法，要求做到既认真负责、严肃处理，又实事求是、关怀同志的政治生命、防止错误的处分，坚持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反对惩办主义，反对一棍子打死，坚持了党在执行党纪方面的优良传统。

有一次，总司令同一个领导干部谈话，发觉这个同志有个人名位思想，便严肃地告诫他说：不要想做大官，要时刻警惕和约束自己；要当心啊，弄不好将来会杀脑袋的哟！在“三反”运动中，这个同志的严重铺张浪费等错误被揭发出来。总司令审阅了有关材料后，派我

去调查核实，并嘱咐说：这个同志十几岁就参加革命，有一定贡献，要按照党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弄清他的问题，分清是非轻重作出严肃慎重的处理；他和刘青山、张子善、宋德贵这些人不同，要保住他的脑袋。经过详细的调查核实，这个同志的上级党委决定给他一定的处分并下放到基层去锻炼。后来，这个同志接受了教训，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后，又重新担任了领导工作，对党的事业继续做出贡献。

艰苦朴素 严以律己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毛主席把朱总司令与红军战士同甘共苦作为光辉范例，教育全党全军坚持艰苦朴素、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读了毛主席这一段话，许多同志，尤其是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的同志，不由得想起总司令的许多感人的故事，如井冈山上的“朱德扁担”，长征过草地之前的“野菜调查队”和“野菜展览会”，太行山时期同战士们一起打“土”篮球，在延安，带领三五九旅的干部搞调查研究，指导开发南泥湾，……等等。更为可贵的是，在无产阶级已取得政权，自己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总司令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党的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除了出国和接待外宾，总司令喜欢穿旧衣服。他办公用的红蓝铅笔，用到只有一寸来长，都几乎拿不住了，仍要继续使用，不让工作人员换新的。他的住室，一直比较朴素。一九五三年以前，总司令住中南海的旧式平房，他和康克清同志只住三间正房，其中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兼会客室，各二十多平方米，再一间是十平方米左右作饭厅用的堂屋。除办公室有几张沙发外，家俱都是一般的。我们工作人员就分住在厢房里。后来，组织上安排他住进一座小楼房。一位参加农民代表团出国访问归来的同志到这个住处探望总司令，她对总司令说：“苏联集体农庄主席的宿舍比您的宿舍还讲究哩！”总司令晚年的居处，住室二十平方米左右，一张旧铁床，一张普通的书桌，一张旧的单人沙发，一个旧床头柜，一盏普通的台灯，一双旧布鞋，床上垫的是一条薄薄的褥子，也已经很旧了。这就是伟人常睡息的一间普通卧室。总司令外出视察时，总是从节约人力物力着想，凡是不多作停留的地方，他常常在车厢中开会、谈话，在车厢中住宿，以减少地方上的麻烦。这些，对比“四人帮”那种前呼后拥、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更显得总司令的崇高伟大。

总司令对自己子女亲属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他教育子女亲属要当普通一兵，不要有任何优越感和特权思想，不要靠父母，要靠自己。在我离开中南海后，有时回去探望他老人家，总司令曾多次留我在他家里吃饭。饭菜是简单的，气氛是亲切的。饭前饭后，都是他孙子、女儿、儿媳端菜盛饭，收拾碗筷。总司令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参加工作都已快四十年或快三十年了。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德才条件担负着党组织所分配的工作，没有因父母的关系而有所“沾光”。这和“四人帮”一伙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相比，正如一座高山和一抔粪土。

朱总司令的一生，是坚持毛主席“三要三不要”三项基本原则的一生。我们在总司令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深深地体会到：朱总司令伟大而谦逊，坚强而镇定；纪律严明而宽宏大度，高瞻远瞩而平易近人；他功高而不自居，德高而不自显。党内外同志都恰如其份地以“德高望重”的赞誉来推崇他。正当敬爱的周总理溘然长逝，毛主席年高病笃，“四人帮”猖